中国与东中欧区际与区域内发展差距的动态演变[①]

GYURIS Ferenc[②]
（匈牙利 Eötvös Loránd 大学区域科学系，布达佩斯）
齐清波 译

摘要: 中国和东中欧国家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本文讨论了这两个区域的区域差异动态性、空间格局和规律。文章第一部分首先对经济背景进行了简要的历史回顾，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空间差异之间的关系，并对威廉姆森倒 U 型假说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第二部分重点阐述空间格局差异，通过对经济改革“赢家”与“输家”的地理定位和描述，运用自相关模型对空间规律进行重点研究，例如东西差异、中心——边缘结构和邻近效应。这一部分对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长期稳定性进行了分析，也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表象背后的原因、以及通过空间规划实现长期动态发展的途径进行研究。第三部分侧重于研究不同地域的地区差异，对东中欧国家之间、国内和中国区际动态不平衡性等进行了分析。本文最后基于相关性和有关规律，对当今全球危机的状况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空间结果、以及危机之后新的发展阶段进行简述。

关键词: 区域差异　中国　东中欧　地域范围　经济危机

一、引言

自二战后的经济繁荣直到石油危机期间，对区域差异的分析是资本主义国家区域研究的主题之一，诸多学者发表了相关成果。大部分成果集中关注特定国家的内部进程，就其数量来说远胜于那些研究多国上述情况的成果。而且，实证结果让研究者们揭示了区域动态不平衡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一些规律（Williamson，1965；Amos，1988）。

然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国际学术界对区域差异的研究开始减少。地理学家对使用数学模型和整体实证方法进行了批评（Kitchin，2006）。不过，区域学家仍对空间差距方面继续关注，但重点逐步放在邻近效应和由于不平等（如移民）所导致的空间流动或全球差距分析等特定方面（Nemes Nagy，2009）

20 世纪 90 年代对差异的新一轮研究兴起，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瓦解，重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版图，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和与此相关的严重不平等的存在，使中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区域统计方法的迅速发展，使得区域专家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检验那些描述西方国家案例的模型。东欧（包括前苏联）和中国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相似之处：（1）相对于更开放的经济体，其经济发展方向完全由政府控制；（2）其国际经济关系愈来愈强

[①] 本文和本人参会均根据匈牙利全国研究和技术办公室的 1.3 原则由 Mecenatúra 基金提供资助。
[②] GYURIS Ferenc (1985—)，男，匈牙利 Eötvös Loránd 大学地理科学系助理教授。E-mail: gyurisf@gmail.com

大；（3）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家和居民将意识到由于巨大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社会局势紧张。

同时，两国也存在显著的差异。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经行了渐进式改革，保持着年均 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东欧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则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迅速转变，经济生产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失业问题日益严峻。此外，在比较研究中，还东欧国家的异质性：前南斯拉夫曾选择了一条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于 1991 年后瓦解，其各部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随后陷入可怕的公民战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局势独特，因为他们在 60 多年的时间中都不是一个独立国家。阿尔巴尼亚 1978 年以后没有官方的国际关系而以东正教斯大林式领导为其特征。前东德也比较特殊，它于 1990 年与西德合并，社会主义经济和体制结构瞬间瓦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与斯洛伐克于 1993 年合并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曾经均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经过社会变革的急剧下滑后，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成功并已全部加入了欧盟。在这些案例中，各国在经济发展路径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差异性：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制度瓦解之前，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化的迹象，因此随后的社会经济恢复缓慢。波兰遭受其之前经济体制功能紊乱的影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选择了休克疗法，导致经济突然转型。另一方面，匈牙利的经济变革更为渐进，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其拥有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1982 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私营部门开始扩大。在 1990 年第一次多党议会选举之前，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私有化运动就已迅速开始。如上所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六国可以归为一类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及的“东中欧”也包括斯洛文尼亚，它曾为前南斯拉夫的成员，并与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和波兰的经济和政治基本相同[①]。

二、区域差异与发展水平的关系

本文所要阐述的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之间的规律是否适合于中国和东中欧。威廉姆森（1965）的研究可作为寻找答案的起点。他以 24 国区域收入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简明的国际横截面分析，认为库兹涅茨所指的中等收入国家[②]区域不平等程度很高，而不平等程度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同时认为中等收入水平以下的国家区域不平等情况较低。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不平等逐渐扩大，而经济成熟增长时期区域将均衡发展或差异程度降低[③]。这些观点即威廉姆森假说，并广为引用和应用（见图 1）。Nemes Nagy 也对经济发展和区域差异关系的背后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是由早期工业化效应所导致的趋异，其次是新创新的自发的空间传播和空间规划所导致的收敛。此

---

① 目前对东中欧和东欧、中欧的精确含义还没有共识，因此对其界定在不同文献中各有表述。

② 指中等收入国家。

③ 根据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威廉姆森所说的成熟增长时期属罗斯托的高和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 (see *Rostow 1960*)。

外阿摩斯指出在后福特经济时期，那些后现代的顶级机构在大都市区的集中导致了新的趋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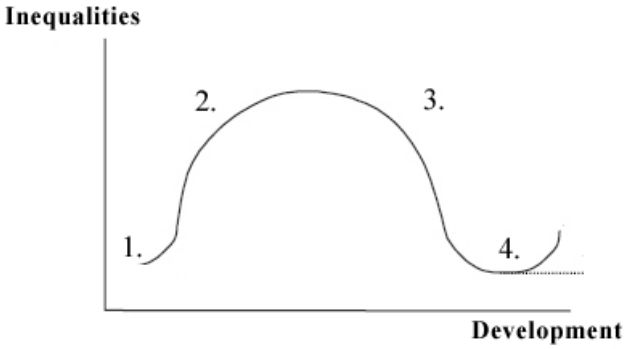


图 1　　威廉姆森倒 U 曲线

资料来源：　Lee (2004)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此假说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验证（唯一例外是在威廉姆森的原文中包含南斯拉夫，但由于南斯拉夫实行第三条道路，因此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威廉姆森提出了在像斯洛文尼亚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是否存在上述规律的问题，但由于没有合适的统计数据，他并没能给出问题的答案。他只是认为该假说应适用于这种类型的经济体制。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统计部门统计指标的现代化[①]，威廉姆森假说在东中欧国家得以验证。然而验证结果在一些重要方面与原始模型存在差异（见图 2）。主要的差异是由于几十年中来显著的、通常也是非市场的一致性——社会主义的空间均衡倾向。这使得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下，这些东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域差异要远低于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改革后经济衰退与发展趋异并存：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回归到初始的资本主义曲线，并可能沿着这一曲线继续发展。尽管有新的均衡存在，但是目前并未在任何国家得到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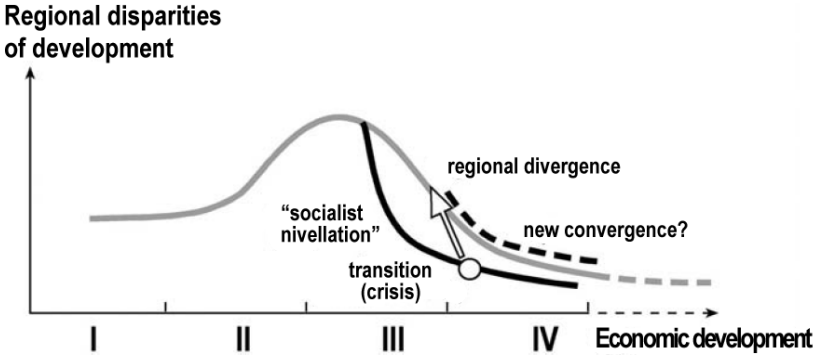


图 2　　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对倒 U 曲线的修改

资料来源（Nemes Nagy , 2005)

[①] 如在匈牙利，地区生产总值于 1994 年首次由中央统计办公室计算和出版。

中国持续三十年经济的迅猛发展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威廉姆森假说或其后社会主义视角能否应用于描述中国的动态区域不平等现象。为了给出合适的答案，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根据中国省级 GDP 数据，计算出 1952—2006 年间的多种不平等指标的数据[①]。虽然在国际文献中不乏研究中国区域差距的文章，但几乎没有基于多种指标和包含 1978 年以前年份的研究[②]。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对整个时期的价值加权标准差、胡佛系数、基尼系数进行了计算，并剔除行政改革的影响，所有数据以 1978 年的 29 个省级单位进行处理[③]。如果我们将给定的各项指标的数据与期初(1952 年)进行比较，便很容易概括指标的动态变化。而且通过这一步骤，所有的指标具有可比性，平均值得以计算，以确保各指标的失真度最低（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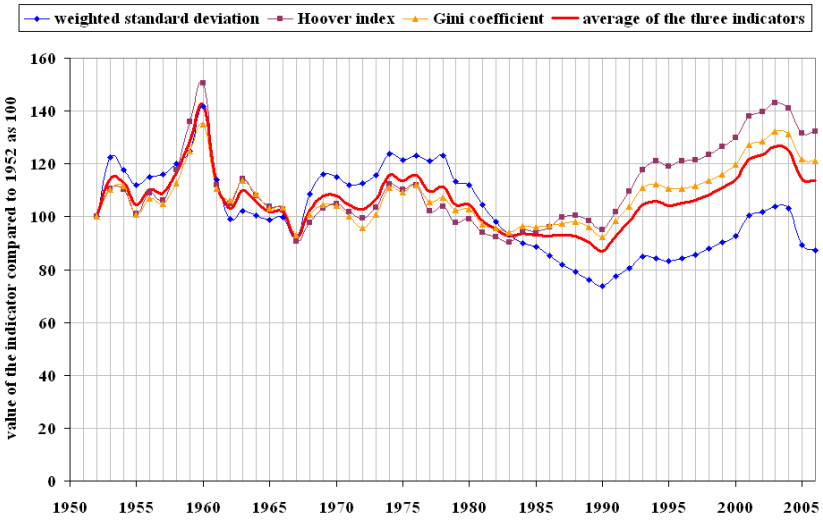


图 3　　基于中国省际人均 GDP 的加权标准差、胡佛系数、基尼系数以及三项指标平均值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

同时，我们应对数据的可靠性进行处理。很多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区域经济数据，尤其是 1978 年以前的数据予以批评，即便它们与当今形势相关（Rawski,2001）。但我们的观点与 Holz(2005)和 Chow(2005)一致，这些数据的质量足够用来进行区域分析。我们认为，如果计算结果有很强的趋势（长期稳定或持续收敛/发散）或空间差异的快速动态变化，便可被接受。据此，对图 3 的解释是：

（1）1978 年以前各项指标没有明确的趋势，以频繁波动为主要特征。除了“大跃进”期间，以温和的波动为主。重要财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重新分配使原来已经工业化的省份经济快速增长，因为这些地区能够比那些以农业为主导的地区更充分有效地利用额外资源。

虽然这一时期人均实际 GDP 翻了三番，但区域差异水平在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内波动（1958—1960 年除外），即经济增长并未引起长期差异的产生。

---

① 这些数据的有效性被中国国家统计局所确认。

② 2007 年匈牙利发展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了 23 篇这一领域的文章，没有任何一篇符合所有三个标准 *(Gyuris 2007, 表. 1.)*.

③ 重庆市被含在四川省，海南省则含在广东省。

（2）自 1978 年起，趋势开始明显，改革开放的第一个 12 年以稳定的区域均衡发展为特征，自 1990 年起开始显现巨大的差异。

综上，中国既不符合威廉姆森的原始倒 U 模型，也不符合“后社会主义模型”。其经济发展与区域差异的关系如图 4 所示：

这一特殊的“中国曲线”与后社会主义模型基本上有以下三点不同：

（1）中国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引入社会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随后引入到东中欧。在东中欧，虽然农业也是其主导部门（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捷克是相对高度工业化的区域），但在这些国家工业化开始比较早，而且它们已经拥有显著的工业生产。相反新中国在成立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这也是 “中国曲线”在第二阶段发展初期与原始的 U 型曲线偏离的原因（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出现）。随后的十年以真正的经济发展、重工业化和长期区域差距稳定为主要特征，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均衡性，在东中欧随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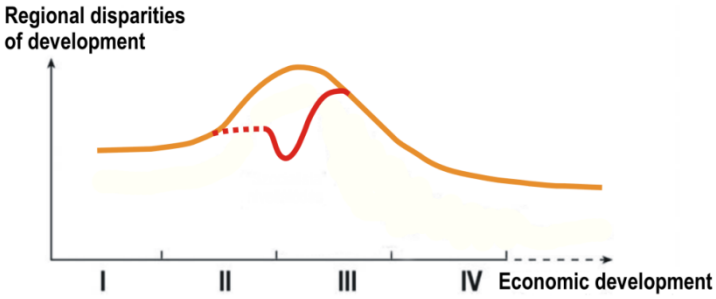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倒 U 曲线的修改模型

（2）渐进式经济改革早期对经济发展具有正面影响，防止了国有部门的突然瓦解，循序渐进式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因此，“中国曲线”水平趋势上的所有组成部分一直指向右侧。而在东中欧，突然的经济转变几乎使其所有部门在一夜之间内全部瓦解，但随后显现出积极影响，这些国家的一部分曲线部分地指向左侧。

（3）中国在经济改革初期的 12 年中表现出空间收敛，这与东中欧正好相反，这种现象取决于一些地理方面的因素。在中国，改革的最大赢家为东南部各省份，而它们在 1978 年经济还不很发达。这些省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空间均衡发展并接近全国经济的平均水平。然而，当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平均水平并保持高增长率，便在国家层面上导致趋异。

东中欧国家间的情形有所不同。以前发达的煤炭采掘和重工业地区经济下滑，而其他一些地区经济则大多是从一个相对贫穷的状态兴起——这多亏了它们有利的地理位置（主要是靠近欧洲核心区域的西部地区），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最为典型。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变革，“赢家”通常仅在一年时间内发展排名至前列，其中匈牙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匈牙利的经济命脉处于西部边界，能够保持其人均 GDP 和收入水平在一个相对好的水平，随后开始迅速增长。同时，传统的采矿业和重工业区开始衰退，落后于新的“赢家”。

三、发展差距的空间分布格局

1. 经济改革所引发的空间格局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对东中欧以及中国的空间发展差异有很大的影响。东中欧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几十年里，其经济结构严重影响着地区发展水平。重工业区的人均生产总值相对较高，他们的发展目标是社会主义体系，其发展是建立在明显的自然资源储备如煤和矿产资源基础上的。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说，他们地理位置的相似性——都位于山区，并且有丰富的煤炭储量。除了这些工业区，以大量相对发达的工业和第三产业为特点的省会城市（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都属于这些国家的领先地区。与此相反，使用大量生产资料以及低城市化的农村则处于地区发展的末端。他们的共同点是地处偏远，经常靠近或者位于边界地区。

然而，经济转型重绘了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尽管省会城市可以进一步改善他们的有利地位，但是重工业地区的主要产业已经产生了戏剧性的崩溃。而且，大部分欠发达地区出现了比以前更快的下降趋势，这些都属于“输家”。“赢家”主要是相对靠近欧洲经济核心区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它们成功地吸引了外国投资，这些投资已经成为所有前社会主义的东中欧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Domański, 2003），后来强大的郊区化形成了大量主要城市地区的“左邻右舍”，这在房地产市场完全集中的时候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原来很严重地被部门经济结构（以及所在地的矿产资源）所影响的空间结构变成了一个新的结构，地理位置成为重要的因素——主要是远离西部边界或者该国的主要中心地区（Nemes Nagy, 1993；Timár–Barta–G Fekete–Kukorelli Szörényiné, 2005）。尽管这一转变甚至会发生在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前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经济改革是这些转变的必要的先决条件(Nemes Nagy, 1987； Lőcsei, 2004)。

地理位置差异的日益重要可以由空间自相关分析证明。如果我们计算出每个匈牙利县级单元（20 单位，即 19 个县和县级单位，首都布达佩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计算它们和各县生产总值的线性关系，得到结果是 1975 年 r =-0.49，当时大多数的情况是贫富比邻而居，这是因为高度发达的重工业地区周围是没有重要矿产资源的穷人区，他们不能参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过程。然而，1995 年空间自相关的值是 r=-0.07， 2006 年 r=+0.29，反映出越来越重要的地理邻近效应。

虽然现有统计数据还不足以使我们计算分析其他的东中欧国家的情况（基本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行政系统在时间上的重大改变所导致的一致性数据的丧失），但根据雷乔区域数据库，我们可以计算出 1995—2006 年的情况。不过由于行政系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在数量上、各国不同地区的平均面积和人口也很不相同（例如，在捷克共和国只有 14 个分支机构在 NUTS3 水平[①]，但是保加利亚是他的两倍，后者国家面积只有前者的 41%，人口只有前者的 26%）。因此，这些国家的空间自相关值不能直接比较，但是他们在 1995—2006 年的改变反映了真实的明显的倾向性。除了斯洛文尼亚，空间自相关值在这一期间是增长的，到了 2006 年，所有的国家都是正增长。

[①] NUTS 是欧洲对不同层次行政区域的统计系统，在本文最后一部分有详细说明。

表 1　NUT3 区域的东中欧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空间自相关系数

国家	N	1995	2006
保加利亚	28	–0.09*	+0.25
捷克	14	–0.29	+0.25
匈牙利	20	–0.07	+0.29
波兰	66	+0.17	+0.21
罗马尼亚	42	+0.48	+0.70
斯洛文尼亚	12	–0.16	–0.24
斯洛伐克	8	+0.55	+0.68

至于中国，在改革时代空间结构的改变并不是很重要。尽管自从 1978 年之后各省的 GDP 增长迅速（从这个方面来说，与东中欧相比，它们不是经济转型的“失败地区”），有些省在改革之初有非常不同的发展地位。原来中国东北领先的重工业地区相对落后很多，“铁锈地带”即黑龙江（在地区排名中下降了 7 位）、吉林（下降 5 位）、辽宁（下降 4 位）、重要煤矿产区山西（下降 4 位），中国内地的一些省份发展水平比较低，但是在他们的经济结构中存在过度开采的采煤和冶炼行业（青海下降 14 位；甘肃下降 13 位；宁夏下降 10 位）。此外，一些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的情况更糟，因为他们能吸引到的新的现代投资很少（西藏下降 15 位；四川下降 8 位）。

另一方面，东南部省份由于沿海，它们从特殊的经济地理区位和开放的口岸中获益良多，它们参与了全球经济并取得了成功。最大的“赢家”是福建（上升 15 位）、浙江（上升 13 位）、山东（上升 13 位）、广东（上升 7 位）。内蒙古（上升 8 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它的主导产业是采掘、冶炼以及化学工业。然而，辽宁省以及作为直辖市的北京，天津的溢出效应导致了在过去这些年中外国投资的动态流入——换句话说，经济改革的积极影响——可以探测出内蒙古快速发展的背景（2006 年，内蒙古人均外商投资几乎是三年前的 20 倍，而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只有 83%）。

总体上，上述趋势导致东部省份[①]经济实力的显著增长，从 1978 年的 59.8%增加到 2006 年的 66.3%，而它们的人口比重则变化较小（从 51.9%到 53.0%）。因此，“东西差异”在过去三十年中进一步扩大。

此外上述情况在东中欧也有表现，即经济变革导致经济结构重要性的下降和地理区位作用的提升，定量方法研究证实了这点。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中国省级地区运用各省区 GDP 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计算出 1978 年、1990 年和 2006 年的相关系数 r 值分别为 0.39，0.41 和 0.60。这说明中国地理区位的重要性是一个先验因素，是中国自然地理多样性的结果。但从时间趋势方面看，两个地区的趋势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各省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我们选取各省人均 GDP 的对数[②]为因变量，自变量为与地理位置有关的各项指标（COAST 为虚拟变量，1 为沿海省份，0 为内陆省份；YCOOR 为各省省会的地理纬度），人口背景（PDLN：人口密度），经济结构（PRILN：

[①] 在本文中，这一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和广西。

[②] 对数可以充分“对比”数据系列以避免忽略非常规因素的影响。

第一产业所生产的 GDP 占总 GDP 的比重；SECLN：第二产业所生产的 GDP 占总 GDP 的比重），资本和基础设施（FDILN：人均 FDI；PTCLN：每 1000 名居民所消耗的邮政和电信服务量）和教育体系状况，作为对劳动力质量的一个直接的强影响因素（THIGLN：每 1000 名居民中从事高等教育学者的数量；TSECLN：每 1000 名居民中从事中等教育的学者数量）[①]，并运用 spss 软件进行估计，并将所有非显著变量逐步从回归模型中剔除，最终只保留回归结果显著性的变量。（见表 2）

表 2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自变量	1952	1958	1966	1978	1990	2006
COAST	–	–	–	–	+0.301 (0.001)	+0.180 (0.013)
YCOOR	+0.294 (0.000)	+0.176 (0.016)	–	–	–	+0.167 (0.001)
PDLN	–	–0.130 (0.094)	–0.242 (0.012)	–	–	–
PRILN	–0.415 (0.001)	–0.724 (0.000)	–0.513 (0.001)	–0.588 (0.000)	–0.329 (0.029)	–0.195 (0.021)
SECLN	–	–	–	–	–	–
FDILN	–	–	–	–	–	+0.308 (0.000)
PTCLN	+0.051 (0.000)	+0.273 (0.002)	–	–	–	+0.384 (0.000)
THIGLN	–	–	–	+0.401 (0.002)	+0.476 (0.001)	–
TSECLN	–	–	+0.549 (0.001)	–	–	–
调整后的 R^2	0.908	0.925	0.844	0.898	0.868	0.948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

在各解释变量中，只有 PRILN 即第一产业在经济生产中的比重在 1952、1958、1966 和 1978 年与被解释变量人均 GDP 显著负相关。根据研究结果，农业重要性越高，地区贫穷的可能性越大，这也是贫穷的农业区域与富裕的工业区域所存在的典型的二元结构。虽然一些变量在一定年份显示与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其偶然性说明这些关系或者在特定的时期内很重要，或者在随机关系背后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在 1978 年之前，所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改革开放以后，地理区位的重要性逐步显现，包括沿海地区的有利影响、北部地区和较高的人均 GDP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后一种关系主要是由于内陆省份中最不发达的区域位于南方地区的原因，而这种分布似乎是随机的，而非因果关系。至于这些地区的发展水平主要并不是源于它们的地理区位，而是部分由于自然地理因素（这一观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尽阐述）。另一方面，沿海区位有其显著的有利影响。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 FDI 流入与通信基础设施网络发展的重要性，这是与东中欧的另一个共同点（Domański 2003, Enyedi 2005）。同时，经济结构的影响要弱于以前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农业经济比重和重要性的降

[①] 我们所选取的指标范围有限，尽管方法需要 1952—2006 年各省区的全部数据，不过，我们所采用的变量已显示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低主要是产业转型的结果，中国第一产业占 GDP 的 11%，因此其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很强，第二产业在 GDP 中的重要性还不显著，说明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新经济结构）并不是很重要。

总的来说，中国和东中欧空间结构发展的变化是由一些很相似的因素推动，地理区位和经济结构作用的增加是其主要的共同因素。

2.长期空间稳定性

上一部分阐述了经济改革之后（社会）发展的空间结构方面变化的主要特征。然而，急十年中是否部分或全部存在稳定的空间结构特征？那就需要计算一个国家内不同区域在两个时期发展地位的关系。例如，对东中欧国家我们可以根据 RCGIO 数据库分析从 1995 年到 2006 年的情况。结果显示这十年内它的空间结构很稳定，但是它也验证了新的空间结构在 1990 年代的前半期已经基本形成，而在 1995—2000 年间有一些小的变化；因此，它的空间结构保持相对稳定。唯一的例外是捷克共和国，其很低的等级（秩）相关值表现 1995 年后其空间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说明转形后它的空间重组过相对较慢。

表 3　　NUT3 区域东中欧国家人均 GDP 排序计算的等级相关关系。

国家	1995;2006	2000;2006
保加利亚	no data	no data
捷克	+0.43	+0.83
匈牙利	+0.77	+0.93
波兰	no data	+0.98
罗马尼亚	+0.77	+0.92
斯洛文尼亚	+0.89	+0.98
斯洛伐克	+0.95	+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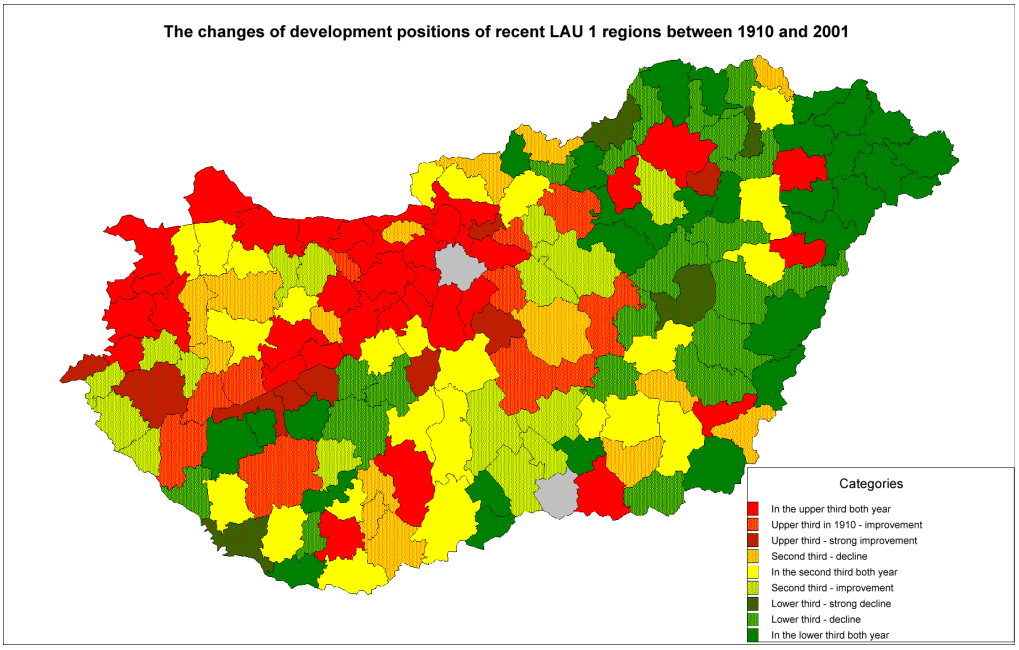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雷乔数据库，欧盟统计局（EUROSTAT）

根据后来计算的 1975 年的国家（NUTS 3）级 GDP 数据集，可以对匈牙利进行更长时间段的等级相关分析。1975 年至 2006 年的（计算）结果为+0.51，与近期的数据+0.77 和 +0.93 相比，这一结果还算显著，前面已经介绍了转型，即以前的发达的采掘和重工业地区的倒退，包含佩斯县内布达佩斯动态郊区圈的出现，与匈牙利西部接壤的国家良好趋势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到等级相关值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家的相对稳定状态。其中之一是布达佩斯，作为匈牙利的绝对中心它稳定地处于榜首。另一份等级表是关于几个欠发达农村地区的，与全国平均的人均 GDP 水平相比它们表现出明显的下降特征，但是这种负趋势不影响它们稳定地处于较低的位次（匈牙利东部的 Szabolcs-Szatmár-Bereg 和 Hajdú-Bihar ,东南部的 Csongrád 和 Bács-Kiskun, 西南部的 Tolna 和 Somogy）。最后，一些在衰退时期后重新获利动力的工业地区在 2006 年的排名与 1975 相近，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发达的基础设施和距西部边境或布达佩斯较近的区位。

更为有趣的是，这也验证了 Győri (2009)的结论，即（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中的一些要素在整个 20 世纪都是稳定的。尽管在这样一个长时期内不能根据 GDP 数据进行分析，因为没有齐全的数据。但是，在 1910 年人口普查时收集了一些关于教育水平、卫生保健、住

房和就业结构的数据，这些数据加总后可以得到现在的 kistérség (LAU1)地区[①]的数据（本文写作时它有 168 个），且可以综合整理为复杂的发展指数指标。把这个新的指标标记在图上，可以看出它与最近的空间结构相似（地图 1）。

近期的布达佩斯——维也纳轴线（匈牙利西北部）附近比较发达的区域在 1910 年时的发展水平居于前列，很明显这是由于它们处于匈牙利最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沿线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而且靠近奥地利。1910 年布达佩斯区域有着优越的位置，在 21 世纪前十年也是如此。相似地，好几个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农村区域及（甚至近期）有着很强农业特征的许多不发达的外围（边远）区域－大多在匈牙利东北部（Szabolcs-Szatmár-Bereg 县)——在过去的一百年内未受影响，至少是根据它们的相对发展状况来说(Győri 2009)。尽管作者强调需要新的研究来解释这些地区一直欠发达的原因，但是远离传统上比较发达的区域（通常是西部和/或该国核心地带）的不利地理位置和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如对成功的工业化俱有阻碍作用）可能是主要的因素，它们在分散的居住结构、欠缺的基础设施的背影下更差，因为事实是尽管这些地区的农业特征很明显，由于受较冷气候，贫瘠土地和生产组织的低水平以及由于竞争导致的年轻熟练群体大量外流，初级部门的产出率传统上也很低。



地图 1　　匈牙利发展空间结构的稳定和变化因素（1910-2001）

资料来源：Győri (2009)

其它东中欧国家也有这种现象。例如，波兰首府华沙、与其南部毗邻的 Cracow 地区、或波罗的海沿岸主要港口城市（如 Gdańsk-Szczecin），数百年来一直是波兰新边境（1945 年后创建）内最发达的地带。相反，波兰东部和东北部的欠发达的农业地区 Warmińsko-Mazurskie、Podlaskie 和 Lublin 一直和匈牙利东北部相似。同样，其它国家也有差异明显的稳定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例如 Transsylvania－罗马尼亚的东部和南部；斯

[①] LAU 系统将在本文下一部分与 NUTS 系统一并阐述。

洛伐克西部的 Bratislava 的主要城市和东部的 Košice－斯洛伐克中部和南部区域）。这些例子引发一个问题：发展的空间结构的传统稳定性在中国存在吗？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计算了不同年份间省级人均 GDP 排名关系值（表 4）。计算结果出乎意料，1952 年和 2006 年为 +0.61，考虑到区域面积巨大、地理位置分散且时间跨度很长，这个结果表明中国的发展空间结构十分稳定。

表 4　　基于省级人均 GDP 的中国等级相关关系

	1952;2006	**1952;1978**	**1978;1990**	**1990;2006**
Value of rank-correlation	+0.61	+0.83	+0.75	+0.89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

为了识别具有稳定排名的区域，我们算出了 1952 年至 2006 年间各省每年的排名，再把它们分别归入以下其中一组：(1)前三，(2)上三，(3)前一半，或者后一半，(4)后三，(5)其它。结果如图 2 所示。一方面，前三集团一直由三大城市圈组成，即上海、北京和天津。这是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素质高、基础设施好以及这些城市在全国的公共管理、商业管理和经济生产方面的领导角色，同时也有统计因素，因为这些地方只有市区，没有农村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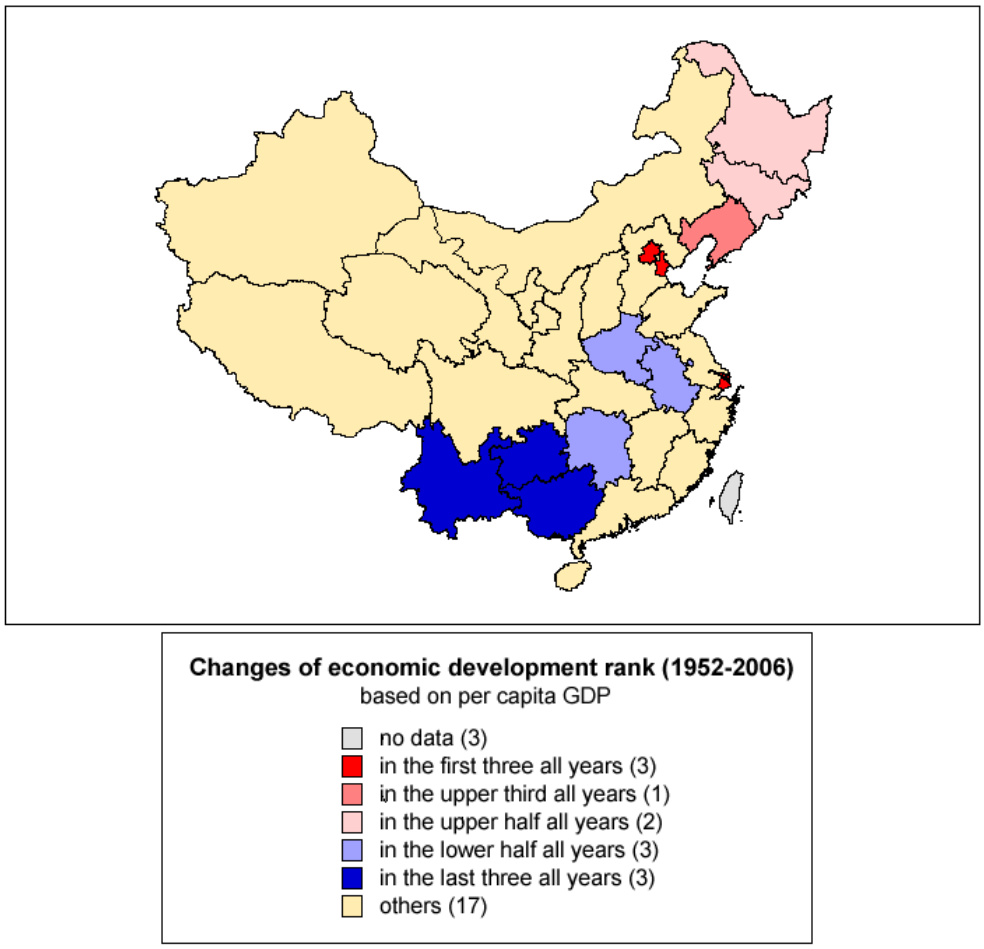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发展空间结构的稳定和变化因素（1952-2006）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

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有利位置。但是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差异明显：1978 年以前这些省份是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1978 年以后，它们不能与快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竞争，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它们面临着传统部门的危机及必须的结构调整过程。它们近期能够归类于前一半基本上是得益于传统上很高的排名。辽宁的情况有些特殊：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它吸引了大量的 FDI，它使得它能够用新兴的竞争力强的工业来补偿重工业的倒退，这是辽宁一直处于上三的原因。同时，华南三省，即贵州、云南和广西没能够赶上来而是一直处于后三位置。而且，贵州自从 1967 年以来就是最落后的省份。原因与上面提到的关于东中欧的情况相似：地理位置偏远，与其中央集权的国家的首都遥远；农业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地形条件较差；基础设施欠缺，人力资本水平低下阻碍了工业化；相对人口过剩；就业不足，这降低了本来就很低的平均产出和工资；最后还有年轻熟练的劳动力大量外流。还有就是俱有独特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占有很大比例，它们与汉族的紧张关系很难处理，同匈牙利东北部的少数民族罗马族和非罗马族间的情形一样。

总之，东中欧和中国都有传统上的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与经济系统中的其它区域相比它们似乎是不能从中攻取发展动力。从空间规划的角度来看这意味一国经济的整体增长和该地区的工程项目不能改善这些区域的状况（尽管总体增长使国家通过再分配给予这些省份特殊的支持成为可能，但是长期中还是存在问题）。因此，可以通过符合当地特点、有针对性的特殊项目来给这些区域发展注入动力。而且必须看到，即使这些方法仅在长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短期内现实的目标是停止进一步的相对倒退趋势。

四、区域差距的动态性和地域范围的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的重点是长期内经济发展及与空间差异之间的规律。然而，在东中欧和中国，因为这些地区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变化，所以对这些地区近期的趋势进行分析尤其重要，这是由于：（1）预测未来趋势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2）由于可比的区域统计资料可供研究人员方便使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可在不同的地理水平使用，可比性的结果能显示出以前隐藏的关系。

在东中欧，可以使用欧盟区域政策所用的 NUTS 系统进行不同区域的分析。该系统包含三个空间层次：称为 NUTS1 ，NUTS2 和 NUTS3 ，面积和人口按次序递减。原来 NUTS 4 和 NUTS 5 也在运用，但后来它们分别改为 LAU1 和 LAU2 （LAU 指地方行政管理单元，新的名称强调了欧盟的理念，据此欧洲联盟的区域规划应处理 NUTS1、2、3 单元，而 LAU1 和 LAU2 的发展决策完全是会员国的事情）。所有类别建立在国家行政系统的基础上，不同的国家的平均规模也不同。这方面有正式确定的标准，根据该标准，NUTS1 单元人口在 300 万和 700 万之间，NUTS2 单元在 80 万至 300 万之间，NUTS3 在 30 万至 80 万之间，不过这一规定有灵活性。因此，有许多地区的人口比正式标准或多或少。东中欧国家的实际情况见表 5。虽然国家之间有明显的差别，NUTS2 单元可以解释为“区域” ，NUTS3 单元为“省” ，LAU2 单元为“直辖市”。

表 5　　东中欧国家 NUTS1、2 、3 和 LAU1、LAU2 单元的名称和号码

Country	NUTS 1	N	NUTS 2	N	NUTS 3	N	LAU 1	N	LAU 2	N
保加利亚	rajoni	2	rajoni za planirane	6	oblasti	14	obshtini	264	naseleni mesta	5329
捷克	country	1	oblasti	8	kraje	14	okresy	77	obce	6249
匈牙利	statisztikai nagyrégiók	3	tervezési-statisztikai régiók	7	megyék+ Budapest	20	statisztikai kistérségek	168	települések	3152
波兰	regiony	6	województwa	16	podregiony	66	powiaty i miasta na prawach powiatu	379	gminy	2478
罗马尼亚	macro-regiuni	4	regiuni	8	judet+ Bucuresti	42	-	-	comuni+ municipiu+ rase	3174
斯洛文尼亚	country	1	kohezijske regije	2	statistične regije	12	upravne enote	58	občine	210
斯洛伐克	country	1	oblasti	4	kraje	8	okresy	79	obce	2928

来源：Nemes Nagy 2009 年，149 页，表 5.4 。

利用雷乔数据库，我们估算出东中欧国家在不同级别的水平和区域差异的动态性，即在国家层面上，有 NUTS2 和 NUTS3。由于选择的指标加权标准偏差，采用了从 1995—2006 年的数据。由于保加利亚只有 2001—2006 年的数据，因此不对其进行分析。此外，由于波兰在 1999 年出现了行政系统的重大变化（ Drajkó 2004 年），就缺少了人口最多的东中欧国家的数据，因此 NUTS3 层次的研究从 1999 年开始。

结果表明趋势的复杂性： 1995—2000 年各国之间的发展差异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新世纪以来有轻微但明显的趋同。换言之，东中欧国家从经济方面的问题上似乎已较为相似，然而，在 NUTS2 级 1995—2000 年期间可以发现分异趋势，并没有趋同性，但自 2000 年以来停滞不前。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做出各国间的其他的动态差距图形，可以明显看出各种情况下 NUTS2 和 NUTS3 的不同的趋势（入不包含斯洛文尼亚，差异只在 NUTS3 级显现，而 NUTS2 数据表明停滞）（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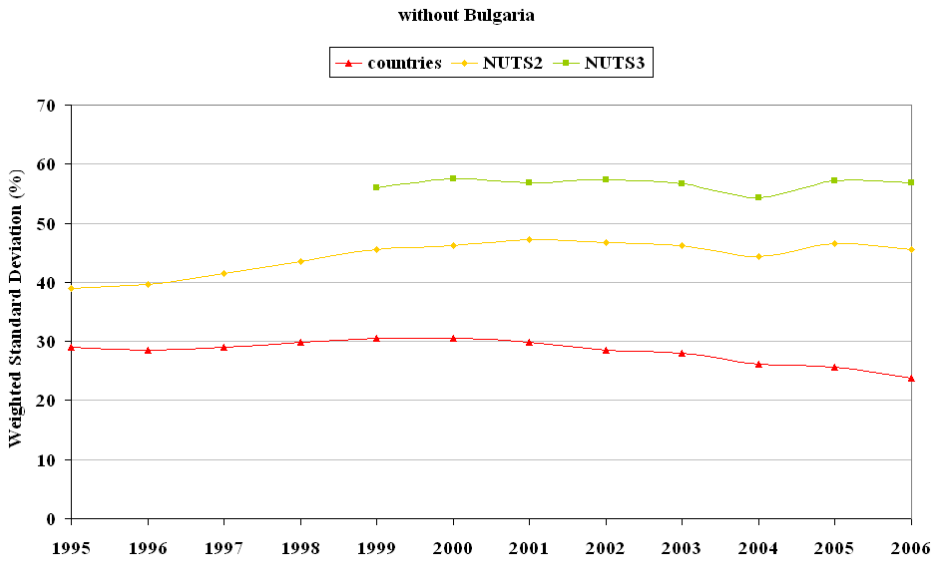


图 5　　根据 NUTS2 和 NUTS3 东中欧国家数据的动态空间差距

数据来源：雷乔数据库，欧盟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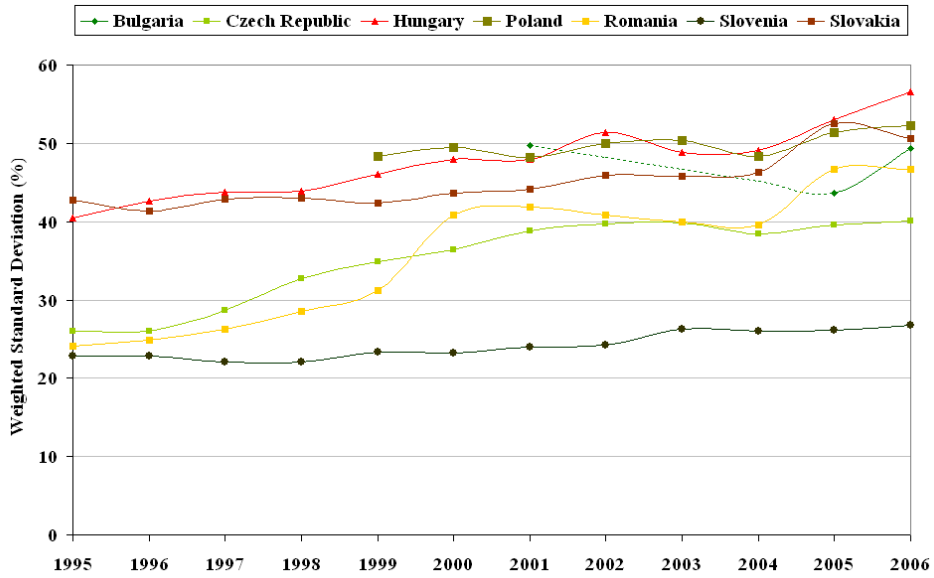


图 6　　NUT3 东中欧国家区域差异的动态性

数据来源：雷乔数据库, 欧盟统计局

对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存在争议。如在欧盟，在会员国层面的差异显示出下降趋势，但地区层面存在趋异趋势，原因很简单，新的核心地区（含首都）即前社会主义的国家经历了快速增长，而其他国家的动态变化则小得多。在新成员国内部的区域之间存在两极分化，但其核心区域的经济增长对全国 GDP 具有强有力的积极影响，因此，会员国的劣势在减少（Szabó, 2008）。

在东中欧不同的趋势背后可以发现以下因素：

（1）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明显的差异是由经济转型（加强东西鸿沟、进一步恶化的边缘地位的农村与农业概况等）所造成的复杂影响，但主要因素是中心——边缘结构的改善（KISS 在 2001 年就此对匈牙利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分析的 7 个国家中的 5 个国家，45-50％的区域不平等根源于首都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该比率只有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较小，因为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较多、而首都人口相对比例较小的国家。然而，核心区域在这两个国家所起的作用的是无关紧要的（25-35％）（图 7）。极为重要的是，在大多数国家首都地区相比该国其他地区的优势平均在增长，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差异（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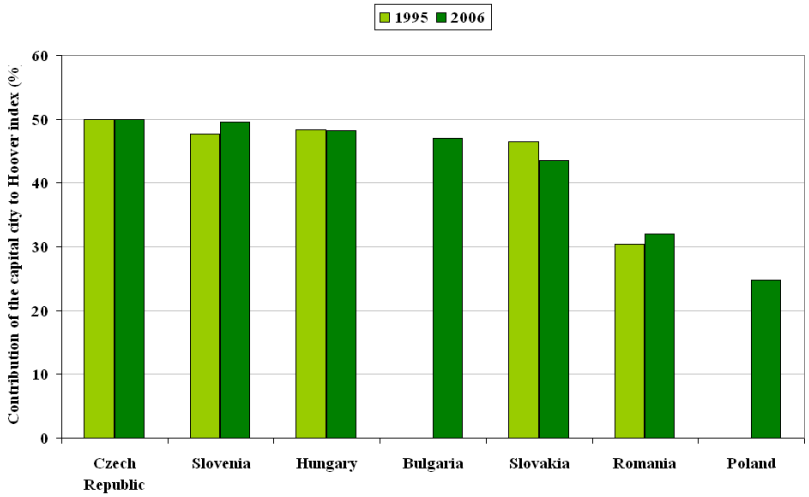


图 7　　NUTS3 首都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胡佛指数贡献

数据来源：雷乔数据库，欧盟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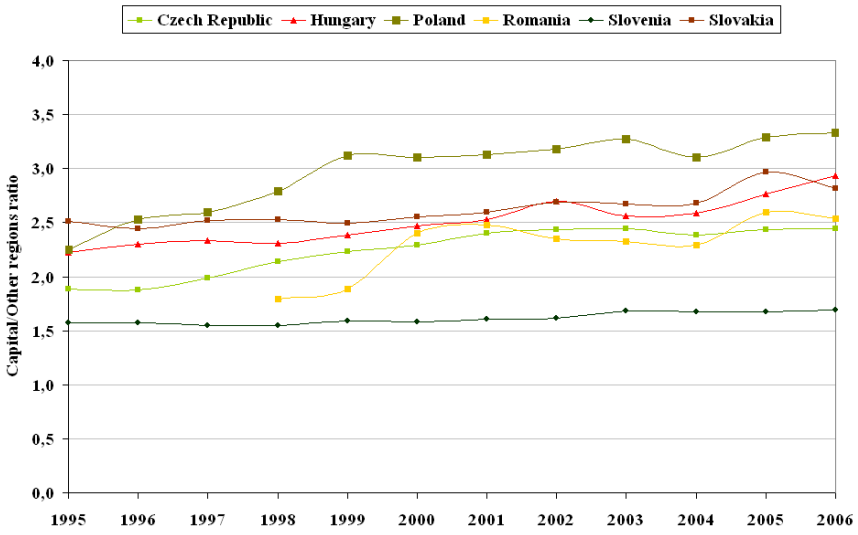


图 8　　首都地区和其他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雷乔数据库，欧盟统计局

（2）为了理解 NUTS3 级的空间差距没有增加的原因，我们以这些地区 200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自变量，以它们在 2000—2006 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进行 β 趋同

性分析（图 9）。虽然在整个东亚中欧这两个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整体之间的联系的，有一点是明确的：罗马尼亚，作为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在此期间表现出显著的经济增长，这是由于罗马尼亚的原先欠发达地区的可能贴近匈牙利，波兰，或捷克共和国区域。另一方面，在相对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各地区的经历了平和的经济增长，而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区域发展趋势是多样化的。所有这些进程指出了总体的趋同性-虽然保加利亚先欠发达地区极其缓慢增长的平衡了这些趋势，从而导致东中欧在 NUTS3 级出现空间差异的停滞（NUTS2 级上的形势基本上是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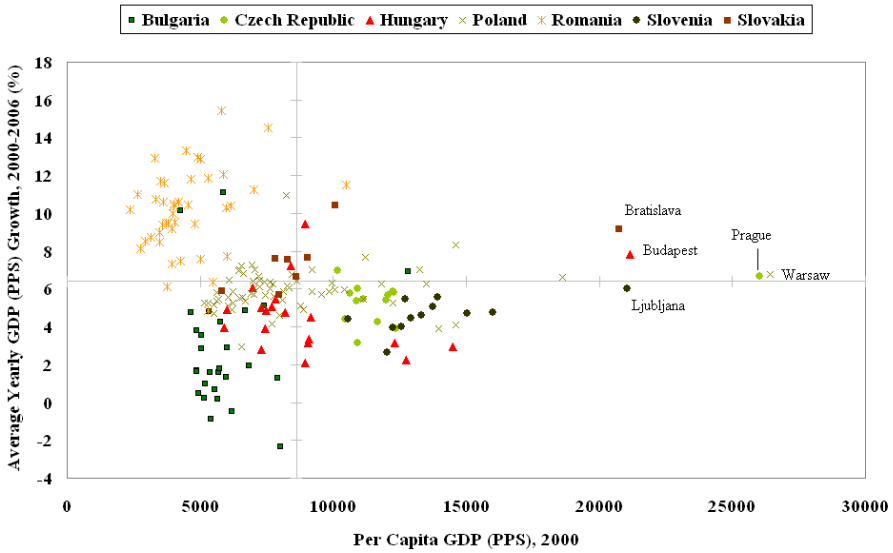


图 9　　NUTS3 区域东中欧国家人均 GDP（2000）和 GDP 年均增长率的 β 趋同分析

数据来源：雷乔数据库，欧盟统计局

这些结果表明两个重要规律。首先，东中欧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经济进程的影响，，即民族经济的相对竞争力。如果国家以较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吸引较多的生产性经济活动（这是罗马尼亚的情况），它们的增长可以促进东中欧的整体均衡。其次，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这些国家空间规划的复兴，它们之间差异仍显而易见，这表明和经济的自发过程（如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向更具竞争力的地区）和部分中心国家的有效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影响力相比，规划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其实这并不奇怪：匈牙利的一项研究表明，对 NUTS3 空间规划的资金支持与其经济发展之间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虽然这对于趋同性将是一个先决条件(Nemes Nagy–Kullmann–Fekete–Szabó 2000)。

对于中国来说，根据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全国不同层面区域差距的动态特征。在第一部分中论及的威廉姆森模型中，发现中国在 1990—2006 年有一个明显的差距。但是，这种趋势在 2004—2005 年（图 3 和第 8 条）被打破。因为这是由于人口统计的方法改变而改变了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此外，如果我们根据县级数据作进行计算，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别（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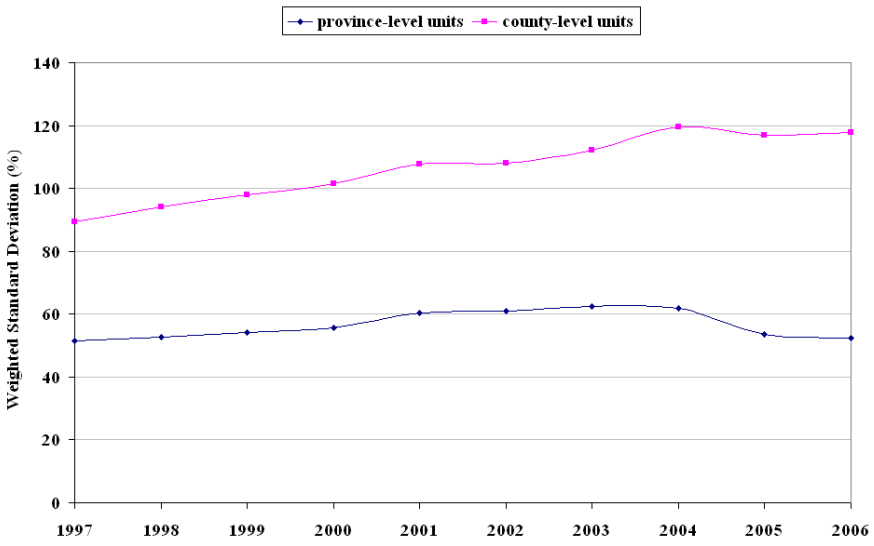


图 10　　1997-2006 年中国省和县级地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标准差

数据来源：中华全国数据中心，美国密歇根大学

若考虑东中欧地区的计算结果，则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象欧洲的首都一样，中国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对区域差异具有全局性的影响？为了得到答案，我们分析了这三个地区对胡佛指数值的贡献。结果清楚地显示：⑴自从 1952 年以来，这个数值增长从没超过 27.1%，表明比起中欧国家，在影响地区差异方面其发挥了很小的作用；⑵其值从 1978 年高峰期的 27.1%，下降到 1991 年的 16.9%，再到 2006 年的 13.7%，我们可以认为，整个改革时代和自 1990 年以来具有重大差异的时期，中国不存在日益增强的中心——边缘特征，相反，区域差异基本上是由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趋势所引起的。

表 5　　1997 年—2006 年各省县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加权标准差的变化情况表

	1997	2006	变化 (1997－2006)
内蒙古	54.49	105.11	+50.62
陕西	53.19	102.87	+49.68
青海	69.06	109.44	+40.37
江苏	75.51	115.29	+39.78
甘肃	73.03	111.29	+38.25
黑龙江	33.98	62.18	+28.20
新疆	113.73	137.39	+23.66
河北	43.32	66.57	+23.25
山西	50.22	71.22	+21.00
福建	41.70	61.46	+19.76
浙江	40.87	59.37	+18.50
湖南	33.77	51.81	+18.04
江西	28.97	46.00	+17.03
广西	37.09	51.35	+14.26
吉林	28.95	41.42	+12.47
河南	51.00	62.86	+11.87
山东	53.81	64.55	+10.74
贵州	44.16	54.28	+10.12
广东	68.47	76.50	+8.03

宁夏	68.14	75.31	+7.17
四川	56.85	63.54	+6.69
安徽	40.41	42.71	+2.30
云南	70.50	71.28	+0.78
海南	30.08	29.87	－0.21
重庆	40.33	39.10	－1.23
辽宁	56.17	53.92	－2.25
湖北	55.06	47.84	－7.23
西藏	113.84	no data	no data

数据来源：中华全国数据中心，美国密西根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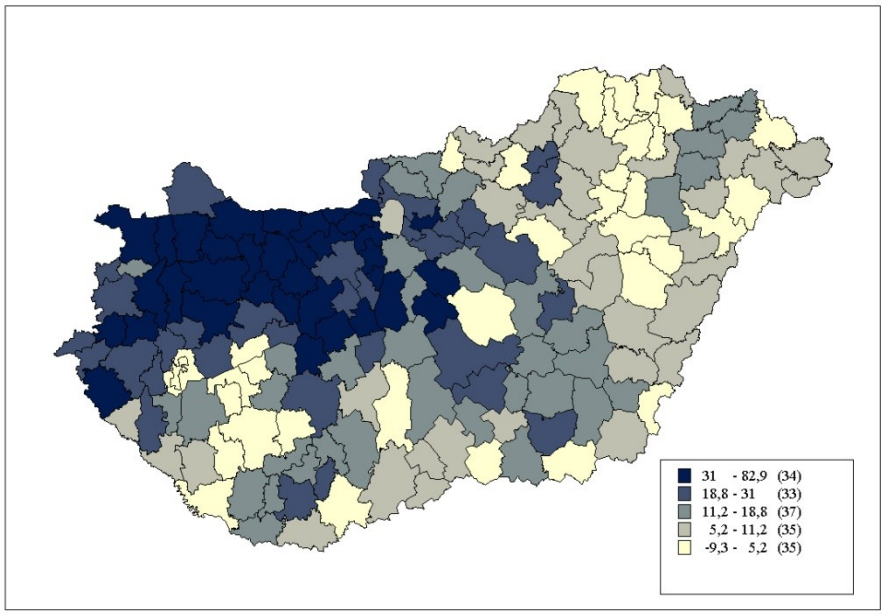
对各省的动态差异的计算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上存在差异。在 28 个省级单位中（不含北京、上海、天津），22 个省份在 1997 到 2006 年之间区域差异扩大，其中西藏的缺乏 2005 年和 2006 年的数据（见表 6）。

我们对 1997—2004 年的数据计算结果表明，不仅在省际、而且全国各县和省内各县之间也存在趋异趋势。但 2004 年—2006 年的数据由于统计方法的改变影响了对省级地区变化趋向的检验，但在县级水平上没有明显的收敛性。据此我们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在中国经济逐步开放的过程中自发经济进程的空间影响作用，和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率优先的国家战略的空间影响作用，尽管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区域差异（后面的因素已严重变化，因为在 2000 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Goodman, 2004) ，但这种战略通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带来显著的空间结构的变化）。

区域差异总是意味着高于平均增长水平和那些低于平均增长水平地区的存在。这两类地区空间定位是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地区水平和动态发展分类（200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其 2000—2005 年年均变化值），在专题地图上描述其结果，下面可以看到：（1）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海岸线省份的特点是经济增长高于平均水平，并显示出潜在的增长优势;（2）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的省份通常不发达，但它们的增长迅速，因此，即使地区差距很可能继续，他们有真正的机会更接近领先的省份；（3）华中各省落后于平均水平，他们的劣势变得更加严重。事实上，他们形成一个空间紧凑的集团，这不仅证明了过去中国改革结构中相邻区域的含义，也是作为欠发达地区不能享有相邻区域发展的溢出效应。这使我们回到文章中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即只有通过有针对性的空间规划才能帮助传统的庞大的不发达地区获得发展势头。

五、经济危机及其可能后果

前文主要阐述了东中欧和中国的空间差异近期和远期的可能趋势。但是，所有结论的前提是整体经济环境稳定，而始于 2008 的经济危机似乎要摧毁这一先决条件。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次危机将持续多长时间，以及会带来如何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我们已经有些让大家看到的一些重要层面的信息。Lőcsei (2009) 编纂和分析的专题地图便是其中之一，它表明，匈牙利 LAU 1 区的登记失业人数在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3 月的变化（地图 3）。



地图 3　　匈牙利 2008 年 3 月-2009 年 3 月官方登记失业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Lőcsei (2009)

上图所显示的区域结构，使我们得到几个基本的重要的结论：

（1）此次危机中受损失最大的是匈牙利的西北部。社会体制转型后，匈牙利的西北部因地理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的 FDI，经历了一场外向型部门的迅速扩张（如汽车制造或移动电话业），并成为了全匈牙利仅次于首都的最发达地区(Barta–Czirfusz–Kukely，2008) 。然而，经济开放也使这个地区更易于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

（2）布达佩斯，作为以高生产率的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最发达地区，在此次危机中虽不能保全，但所受影响也要远远小于西北部；

（3）迄今危机对匈牙利欠发达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受危机影响的空间差异表明，首都和整个国家的差距在不断扩大，速度也较以前更快，尽管首都以外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在下降。由于以上两种趋势的方向是相反的，发生突然发散或收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由于中心边缘二分法可以加强，结构的不平等现象也可能会多少有所变化。当然，在危机之后，最近的输家——由于他们的有利条件——有良好的恢复势头的可能性，同样，危机前的地区差距也多少可能会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期开始重现。像以前东中欧国家以高比例外向型生产为特点的蓬勃发展的其他地区一样，可能的空间差异变化也会类似的出现在匈牙利。

这种情况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经济改革的最大赢家，也就是与世界市场联系最紧密的东部与东南各省，他们中的一些省份，年出口额已超过了其 GDP 的 50%。正由于此，这些地区的失业人数与经济下滑也是最高的(Csanádi–Lai–Gyuris 2009)。整体而言，经济危机至少可以在省级层面上缩小区域差异；但是，在失业影响大部分外地转移劳动力的事实面前，经济危机的负面后果将有可能通过中心城市传向边缘地区，也可能从沿海省份传向欠发

达的内部省市——就像20世纪90年代曾发生在匈牙利的农村转移劳动力首先被布达佩斯的公司裁掉一样。

然而经济危机后的年份，东中欧国家与中国的基本处境却不同。正如我们之前所论证的，由于体制转变，国家一级的空间规划一直未能弥补自发经济进程中导致的区域分化。此外，这些国家的高额债务与较少的财政收入，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有效干预经济的空间非常有限，即使他们能够做到，他们的主要目标也大概是加快整体经济增长，而非缩小地区差异。

相反，中国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和相对较少的外债。这使得中国有能力推出一个 5850 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方案，这为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良好契机。然而，问题是这一揽子方案会对将来的区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它的目的是恢复经济活力，其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将可能与危机前类似，导致各领域水平的差异的显著扩大与增长。但是，如果该一揽子方案包含改变以前空间结构以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直接措施，中国将获得更长时间的和谐发展。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是非常可能的：东中欧仍将是被动地参与该事件，而中国则有足够的工具来发挥积极作用。

六、结论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和东中欧国家区域差异的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如前所述，没有任何一个区域符合 Williamson 的倒 U 型曲线：在改革之前，由于大量的政府干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与东中欧的区域不均衡都相对低于假设水平；然而，此后的改革开放却带来了区域差距的显著扩大。另一方面，东中欧国家和中国修正后的“U”型曲线模型多少不同，在社会主义伊始阶段，中国处于更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它却经历了 1978—1990 年的区域趋同的暂时性阶段，因为此前落后的东南地区发生了大量富有生命力的变化。

在区域方面，可以发现，省会城市和大城市地区更容易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此外，经济结构对区域差异的影响作用明显减弱，而地理区位和空间效应却比以前更为重要。因此，原工业区成了改革的“牺牲者”，而接近全球核心领域的地区则可从该变化中大获裨益。

另一方面，中国和东中欧的区域都呈现出相对更加稳定的特点。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大都市地区的积极稳定局势，还在于不发达地区（主要是人口素质低、基础设施差、人员外流严重的边远与农业地区）。这些落后地区无法调动任何经济资源，这说明他们的发展只能通过国家层面对这些区域实行特殊性的差别政策来实现。

本文也了地理规模对区域差异结果的影响。东中欧国家之间的融合（如欠发达国家因宏观经济优势能够赶上其他国家）与国家内部分异（主要是由于中心——边缘结构强化导致的）并行。从其他方面来看，两个趋势的原因又可以发现这样益而高的事实，即这些地区的自发经济进程的倾向强于任何区域规划项目。对于中国，1990 至最近 10 年各种区域层面上的巨大差异，反映了自发经济趋势的共性和效率优先的国家经济政策，直到最近这些年才对区域均衡发展有所重视。

然而，金融危机对区域空间发展趋势具有很大影响。最消极的后果可能体现在出口外向型的区域，“赢家”的转变，见证了增长的严重回落。相反，传统落后的农业地区面对的新挑战较少，这大概引起了省际间的趋同——除了拥有长远提升相对地位的主导中心区域。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别，东中欧国家没有有效工具调节区域进程，所以新的区域就将主要由自发经济趋势形成。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因为中国有很强有力的经济工具，因此中国可以强有力的干预危机，而后出现新的区域结构——是区域的进一步分化还是区域趋同，基本取决于国家的政策。

参考文献

Amos, O.M., Jr. (1988): *Unbalanced regional growth and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latter stages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8/4., pp. 549–566.

Barta, Gy.–Czirfusz, M.–Kukely, Gy. (2008): *Re-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World and in Hungary.* European Spatial Research and Policy 15/2. pp. 5–26.

Chow, G. (2005): *Are Chinese Official Statistics Reliable?* http://www.princeton.edu/~gchow/Are%20Chinese%20Official.doc

Csanádi, M.–Lai, H.–Gyuris, F. (2009): *Global cri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stitute of Economic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Discussion Papers 2009/5. http://www.mtakti.hu/file/download/mtdp/MTDP0905.pdf

Domański, B. (2003): *Industrial Chang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Postsocialist Economy. The Case of Poland.*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0/2., pp. 99–118.

Drajkó, P. (2004): *Lengyelország közigazgatásáról.* [About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Poland] Comitatus 14/1–2., pp. 87–93.

Enyedi, Gy. (2005): *Process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socialist Hungary.* In: Timár, J.–Barta, Gy.–G Fekete, É.–Kukorelli Szörényiné I. (eds.): Hungarian Spaces and Places – Patterns of Transition. Centre for Regional Studie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écs. pp. 18–27.

financialexpress.com: China’s economy shows signs of recovery on stimulus. 14.02.2009. http://www.mtakti.hu/file/download/mtdp/MTDP0905.pdf

Goodman, D.S.G. (2004): *The Campaign to „Open Up the West”: National, Provincial-leve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The China Quarterly 178. pp. 317–334.

Győri, R. (2009): *A magyar fejlettségi térszerkezet történeti meghatározottsága.* [Historical determin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in Hungary] Tér és Társadalom [Space and Society]. Manuscript, in press.

Gyuris, F. (2007): *A fejlettség regionális egyenlőtlenségei Kínában.* [Regional Inequaliti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Tér és Társadalom [Space and Society] 21/3., pp. 143–165. http://www.rkk.hu/TET/2007_3/TET_2007_3.pdf

Holz, C.A. (2005): *OECD – China Governance Project.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duction of Statistics.* OECD Statistics Working Papers 1.

Kiss, J.P. (2001): *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Hungary.*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8/4., pp. 321–328.

Kitchin, R. (2006): *Positivistic geographies and spatial science.* In: Aitken, S.–Valentine, G. (eds.): Approacher to Human Geography.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pp. 20–29.

Lee, S.S. (2004): *Spatial Dynamic Variation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Korea and Japan.* Studies in Regional Science 34/1. pp. 97–116.

Lőcsei, H. (2004): *A foglalkoztatás ágazati és regionális dimenzióinak kapcsolata az ezredvégi Magyarországon.* [The relationship of structural and regional dimensions of employment in Hungary at the millenium] In: Nemes Nagy, J. (ed.): Térségi és települési növekedési pályák Magyarországon. [Regional and settlement-level growth lines in Hungary] RTT 9.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Regional Geography. Budapest. pp. 43–58.

Lőcsei, H. (2009): *A válság földrajza – nyertesekből vesztesek.* [The geography of the crisis – winners becoming losers] Világgazdaság [World Economy] 15.04.2009

Nemes Nagy, J. (1987): *A regionális gazdasági fejlődés összehasonlító vizsgálat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kadémiai Press. Budapest

Nemes Nagy, J. (1993): *Adalékok a térbeliség társadalmi magyarázó erejéhez.* [Additions to the social explaining force of spatiality] In: Enyedi Gy. (ed.): Társadalmi-területi egyenlőtlenségek Magyarországon. [Social-spatial disparities in Hungary] KJK. Budapest. pp. 23–37.

Nemes Nagy, J. (2005): *Fordulatra várva – a regionális egyenlőtlenségek hullámai.* [Waiting for a turn – the waves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Dövényi Z.–Schweizer F. (eds.): A földrajz dimenziói. [Dimensions of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Institut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udapest. pp. 141–158. http://geogr.elte.hu/ref/pdf/nnj-hullamok.pdf

Nemes Nagy, J. (2009): *Terek, helyek, régiók. A regionális tudomány alapjai.* [Spaces, places, regions. Fundaments of regional science] Akadémiai Press, Budapest

Nemes Nagy, J.–Kullmann, Á.–Fekete, A.–Szabó, P. (2000): *A területi fejlődés „állami" és „piaci" útjai az 1990-es években.* [„State" and „market" way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990s] Területi Statisztika [Regional Statistics] 3. pp. 203–220.

Rawski, T.G. (2001):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2/4, pp. 298–302.

Rostow, W.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zabó, P. (2008): *A gazdasági fejlettség egyenlőtlensége az Európai Unió különböző területi szintjein.* [Ine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spatial level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erületi Statisztika [Regional Statistics] 11/6., pp. 687–699.

Timár, J.–Barta, Gy.–G Fekete, É.–Kukorelli Szörényiné I. (2005): *Politics, Society and Economy in Space: Spatial Processes in the Era of Transition in Hungary.* In: Timár, J.–Barta, Gy.–G Fekete, É.–Kukorelli Szörényiné I. (eds.): Hungarian Spaces and Places – Patterns of Transition. Centre for Regional Studie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écs. pp. 1–16.

Westlund, H. (2000): *The Soviet paradox: imbalanced equalisation and balanced divergency.* In: Westlund, H.–Granberg, A.–Snickars, F. (eds.):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ussia. Past Policies and Future Prospec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Northampton. pp. 1–36.

Williamson, J.G. (1965):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3/4., Part II., pp. 3–84.

数据资料

EUROSTAT Regio database.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statistics/them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ll China Data Center. http://chinadataonline.org/